

迈入新时代,全力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2018 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今年是第十屆,主题为“迈入新时代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论坛共同轮值主席易纲,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方星海分别发表主旨演讲。

■本报记者 钱蓓

易纲:继续支持上海金融对外开放先行先试

“上海一直是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党中央、国务院站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交给上海的一项重大使命。”易纲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中国人民银行一直高度重视和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下一步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继续支持上海在金融对外开放方面先行先试。

他阐述了支持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五方面举措。首先是坚持市场驱动原则,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支持上海创新试点人民币跨境业务和产品,发挥好大宗商品人民币定价结算功能,充分利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投融资支持。

其次是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支持上海先行先试外汇管理改革,拓展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自由贸易账户功能,推进资本项目的管理便利化和可兑换。

第三,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上海在我国股市、债市、货币市场、汇市发展中都发挥着最重要作用,今后将在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交易的便利程度和效率,法制环境和市场环境,交易的托管、清算等基础设施方面加强建设。

第四,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未来主线是,按照国民待遇原则,逐步放开股比限制和业务牌照限制。在金融机构建设方面,未来一段时间,上海将是中国的亮点和世界的亮点。

第五,在引领金融科技发展方面,上海也有巨大潜力和优势,今后这方面的发展还会进一步加快。

易纲还在随后的主旨演讲中探讨了如何从金融角度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并建议,金融机构要覆盖小微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同时,鼓励正规金融成为小微企业融资的主力军。

郭树清:以“自我革命”主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就金融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题。郭树清认为,要从国情现实出发,以“自我革命”的理念和方法,主动消除经济金融隐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以经常的‘小震’释放压力,避免出现严重的‘大震’,总体上要用事先而不是事后,主动而不是被动,整体而不是零散的方法,矫正各种偏离,恢复经济金融平衡。”郭树清表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几点重要经验:一是底线思维,防患未然;二是稳定大局,逐步加严;三是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四是区别对待,分类施策;五是抓住时机,攻坚克难;六是标本兼治,依法规范;七是回归本源,服务实体;八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九是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

一组数据反映了银保监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成效。比如,针对交叉金融野蛮生长、影子银行急剧膨胀等突出问题,银保监会开展市场乱象综合整治,遏制银行业和保险业资金脱实向虚的势头。一年多来,银行业在保持12%以上信贷增速的同时,总资产规模少扩张20多万亿元。在展业方式和总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保险业的保障功能不断增强,今年前4个月,人身险中纯保障类产品占比上升2.9个百分点。

去年以来,银保监会督促银行利用当前拨备较充足的有利条件,做实贷款分类,真实反映信用风险,目前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之比,已由高峰期的近120%降至100%以内;鼓励银行综合运用坏账核销、现金清收和批量转让等手段,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2017年以来共处置不良贷款1.9万亿元。

对于金融业对外开放,有人担心开放金融服务业可能冲击中国金融市场,引进外资股东可能威胁国家金融安全。郭树清直言:“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到目前为止,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市场份额只有1.3%,外资保险公司份额不过6%左右。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更无法想象有许多中国金融企业进入全球银行业和保险业前列。”

方星海:需要有国际话语权的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国家战略,怎么理解?方星海认为,不是上海要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是中国需要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并决定把它放在上海。

“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增长有本质不同,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群众的需求更趋多样化,需求的变化频率显著提高,投资面临的市场风险大大增加。从供给角度看,能够满足不断变化需求的生产技术必定是创新型的,但它们本身能否成功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这个阶段,更能评估、吸收和分担投资风险的资本市场,是投融资更恰当的场所。”方星海介绍,去年下半年以来,证监会加紧改革,加大对新技术、新产业的支持力度,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

扩大开放是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必由之路,证监会加大了资本市场开放力度,不断完善沪港通、深港通规则制度,扩大标的股票范围和每日额度,目前累计成交金额已达到10万亿元。自5月31日A股顺利纳入美国明晟指数(MSCI)到6月11日为止,沪港通和深港通日均净流入达到31.6亿元。证监会已会同有关部门着手研究新的制度与工具安排,以便尽快将A股纳入MSCI的因子从5%提高到15%左右。今年以来,期货市场对外开放也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上海原油期货上市不到3个月,交易量和持仓量均超过迪拜原油期货,稳步迈入世界前三。接下来,证监会还将推动更多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引入境外交易者,服务国际大宗商品贸易、产业升级调整和实体经济及金融企业的风险管理需求。

方星海表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山雨欲来风满楼,国际投资者投资配置向人民币倾斜的态势非常明显,现在是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大好时机。从国际竞争格局来看,中国需要一个有国际话语权的国际金融中心。”



“2018 陆家嘴论坛”昨天在沪开幕。本报记者 袁婧摄

金融危机教会了我们什么?中外嘉宾展开讨论——

金融治理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

■本报记者 张晓鸣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十年,世界经济逐步回到复苏轨道,但风险和不确定性依然存在。面对增长动能、发展方式、全球化进程和经济治理体系等多方面的深刻转变,世界经济如何实现新的持续性增长?全球金融治理体系需要怎样进一步完善?

昨天,2018 陆家嘴论坛第二场全体大会上,与会中外嘉宾围绕“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经济与金融治理体系建设”展开讨论。

在国际金融治理上应该思考 还有哪些需要做

在国际金融治理上,各国都做了大量工作和改进,包括采取经济复苏政策克服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在危机过程中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筹集资金,防止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流动性短缺。

但是,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昨

天提醒:“我们应该去思考一下还有哪些需要做的,这对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进,以及防范新一轮危机有什么重要作用。如果不做的话,真是没有把握说新一轮危机不会再来。”

他认为,金融体系中有过多的顺周期因素,正反馈机制,容易使系统大起大落。目前已经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来引入负反馈的机制,减少顺周期性。但是这个做法并不有效彻底,经济体系中仍有非常强的顺周期特征、正反馈特征。

此外,过去十年间,各国都试图解决但未能解决的是“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周小川指出,大机构资本比例应该增加,同时,如果一级资本不能解决问题,需要引入“自救债券”和“应急可转债”。

他还提醒,本轮金融危机对新兴市场带来的不利冲击,很大程度是由于资本流动所造成的。他表示,虽然国际市场充分重视并不断更新观念,但实际问题还可能继续出现,阿根廷、土耳其等其他一些国家,在当前的形势下可能再次出现资本流动异常。

在渣打集团行政总裁比尔·温特斯看来,金融危机过去十年了,应该是时候考虑如何加强市场灵活性,如何不断改进监管框架使其更适合需要等问题了。他表示,无论是对资本的流动,还是对产品和服务的流动,金融机构都可以起润滑剂的作用。

促进全球跨境直接投资稳定增长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跨境直接投资(FDI)已连续三年下降。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屠光绍指出,这个下降趋势如果持续下去,将不利于全球资本的流动,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屠光绍说,FDI能够通过跨境投资来进行全球资源的配置,改善全球资本流动的状况和结构。另外,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特别需要加快全球跨境投资来支撑,来更好地形成全球新的产业链。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截至目前,全球有近60个国家都制定了吸引外资的政策。他分析,全球FDI下降的主因来自欧美

发达国家,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FDI依旧保持稳定增长。“可见,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对投资的限制已对跨境资本流动造成了影响,从而也会对下一步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

为进一步促进全球FDI稳定增长,屠光绍认为,这需要有全球共识,特别是一些国家在促进FDI跨境资本流动的方面,需要有更开放的心态,同时还要有更积极的措施。从全球范围来讲,需要尽快促成全球投资的协定,要更加注重投资环境、营商环境的优化,要采取更多更有利的措施促进全球跨境资本的流动,特别是为吸引FDI创造更好的环境。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和新经济的发展,需要全球的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给予配合。

针对贸易保护主义,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指出,贸易障碍有物理行为障碍和政治障碍两种。物理行为障碍包括交通成本、信息成本、执法成本、信任成本和对于经济的无知,这些障碍现在正逐步减少。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主流认识还是鼓励竞争和促进交易的。

专家探讨防范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和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可行路径

深化金融改革推动新经济增长

■本报见习记者 王嘉旒

从“黑天鹅”“灰犀牛”到明斯基时刻,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各类风险中,金融风险可能尤为突出。而另一方面,全球金融风险也越来约受关注。北京时间昨天凌晨两点,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并将今年可能加息的次数从原先的三次增至四次,其释放的紧缩政策信号冲击着不少新兴市场。

作为未来三年中国三大攻坚战之一,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成为金融领域的热门话题。各方专家昨天齐聚陆家嘴论坛第三场全体大会,探讨防范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和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可行路径。

“穿透式”监管整个市场交易者

相较于海外金融市场每天不断变化的交易策略、交易平台、交易产品,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王江认为,中国在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由于金融市场监管框架的不同,我国

监管机构对于金融市场掌握的信息更为全面。不论是参与者特征、交易记录,还是交易动机,种种具体信息都尽数被监管机构所掌握。通过“穿透式”监管,政府可以将整个市场交易者的信息汇总起来,建立系统性风险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监管框架。

学界的观点快速传导至监管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表示,正初步考虑建立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监管框架。宏观审慎主要是防范跨境资本流动的重大风险和维持外汇市场基本稳定,而在微观市场监管方面,将创新外汇管理方式,注重从事前转变至事中事后管理,从正面清单转到负面清单管理等。

充分激活原有市场资源

要让经济增长稳步驶入“快车道”,盘活现有资源成为重要选项。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认为,实体经济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且坚定处置“僵尸企

业”。过去几年清理出的“僵尸企业”只是“冰山一角”,它们占据了大量信贷资源,阻碍实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如果不将其清理干净,就无法用货币“活水”来支撑新的经济活动。

闲置土地,也是亟待盘活的市场资源之一。不论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还是二三线城市,空置土地现象普遍存在。杨伟民认为,应对土地资源浪费现象,政府可以赋予农村宅基地的充分物权,可以通过长租等方式让土地流转起来。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认为,政府可以探索住房租赁金融业务,从而切实改变房地产单一的市场供给结构和资金配置方式。通过一些政策培育,引导空置住房流入市场,这一举措将会大大改善存量住房的收益。在提高存量住房市场风险承受能力的同时,也将实现原有社会资源的效益提升和充分利用。

解决创新驱动“动力源”问题

发展新产业、新业态需要创新,而创新又

要靠人才。与会专家透露,两年前,西南交大在四川省成都市政府的支持下,在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出台西南交大九条,目前已有180多项成果分割确权,相关方面还成立了高科技公司。如今,科技成果转化对于西南交大的科研人员来说已经不再是难事。“惟有推动科研产权制度改革,才可以解决科研人员产权激励问题,从而解决创新驱动的‘动力源’问题,解决我国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杨伟民说。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大卫·洛克菲勒讲席教授拉斯·彼得·汉森也认为,创新是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石,而其中小微企业更是社会重要的创新细胞。人们欣喜地看到,在一些关键领域,金融的可获得性和融资机会越来越多,也有人因此担心会带来金融系统性风险。然而,拉斯·彼得·汉森表示,人们更应警惕过度监管的危险,过度监管可能会使得新行业、新业态无法蓬勃发展。

关于“普惠金融”,学者专家一致认为——

每个人都能享受合理金融服务

本报讯(见习记者王嘉旒)固定成本、人员成本、基础设施成本……银行线下网点如今面临着高企的成本压力。然而,上海银行董事长金煜认为,这些传统线下网点并不会消失,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或是未来线下网点的的发展趋势。在昨天的陆家嘴论坛第四场全体大会上,高校学者、业界专家围绕“普惠金融”展开热烈讨论。他们一致认为,科技的快速迭代发展让普惠金融成为可能,每一个需要金融服务的人都能享受到合理的金融服务,这一天并不遥远。然而,想要切实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无论是监管机构还是银行,都需针对种种挑战提出可行解决方案。

技术的“泛在化”大大降低了金融服务的使用成本。新开发银行行长卡马特对此深有感触。过去六年多,印度的银行服务成本越来越低,更多的穷人也可以负担得起这项曾经被认

为只能“束之高阁”、普及度极低的服务。而低廉的成本,为印度银行业带来的是成倍增长的客户数量。科技为传统金融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保董事长缪建民感同身受。今年以来,保险行业保费增长乏力,寿险业甚至出现了多年未见的两位数负增长。缪建民认为,新科技革命对保险商业模式和技术运用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科技的发展要求传统保险业转变风险管理方式。比如,通过车联网技术对汽车风险进行事先管理,运用生命科技技术对人身保险中的死亡风险、疾病风险等进行事先管理。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还为风险管理范畴的延伸提供了可能。一些小微风险在旧技术条件下无法提供保险服务,而在新技术条件下,这些小微风险也可以购买保险,比如航空延误险等。

在中国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

李均峰看来,我国发展普惠金融面临着五大机遇。其一,制度优势和体制优势,政府已从顶层设计上为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保障。其二,已经形成的多元化、多层次机构和产品供给体系。其三,以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中国金融领域快速应用。其四,一系列政策推出,对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实施差异化监管,能激励更多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其五,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多新兴领域、新兴产业对金融服务产生更大需求。

普惠金融正逢黄金机遇期,当然也需应对随之而来的种种风险。比如,普惠金融在中国落地仍面临着庞大的企业和人口数量。此外,目前普惠金融还面临融资成本高等问题。而普惠金融客户带来的违约风险也让其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银行间市场首只交易型债券指数发布

本报讯(记者赵松)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中国银行昨天在上海联合发布“CFETS-BOC交易型债券指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国银行交易型债券指数)。该指数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中国银行共同编制,是银行间市场首只交易型债券指数,力争打造债券指数的中国品牌,完善金融市场的“上海价格”。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波,中国银行董事长陈四清出席指数发布仪式。

“CFETS-BOC交易型债券指数”将包含CFETS-BOC国债交易型指数“CFETS-BOC政策性金融债交易型指数”“CFETS-BOC高信用等级债券交易型指数”“CFETS-BOC高信用等级同业存单交易型指数”四只子指数。该指数基于银行间市场各类债券的交易特点,综合考虑债券成交量、做市机构数量等交易性因素,选取数量适中的活跃券作为指数样本券,为境内投资者提供准确、实用的业绩基准。同时,该指数交易型的特点便于复制样本券以构建相关指数产品。自即日起,该指数于每个交易日的18时通过中国货币网和中国银行官网对外发布。

近期,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获得央行批复后,计划在银行间市场引入的债券指数产品,并为相关产品提供认购、申赎、交易和信息披露等服务。中国银行作为银行间市场的核心做市商,将成为首家发行人,依托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面向境内外投资者推出挂钩该指数的指数产品。